

杜婷娜著「儒士與夷使： 韓國的開放，1875–1885」

張 存 武

杜婷娜 (Martina Deuchler) 女士，歐洲瑞士人，一九六〇年代赴美國哈佛大學讀東亞史，並以有東方瑞士之稱的韓國為研究對象。其博士論文為：“The Opening of Korea, 1875–1884”。畢業後繼續研究此一專題，東到漢城閱奎章閣李朝檔案，西到英倫覽國家檔案局及怡和洋行有關韓國外交、貿易資料，而西德、美國之公私收藏亦在其蒐羅之中，至於中國、日本文獻自亦為主體材料。^①書成，一九七七年由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為英國皇家亞洲協會韓國支會 (Royal Asiatic Society, Korean Branch) 印行出版，名為 Confucian Gentlemen And Barbarian Envoys, The Opening of Korea, 1875–1885，筆者中譯為「儒士與夷使：韓國的開放，1875–1885」。綜計此書之寫作歷十四五年，而其出版亦為紀念女士之亡夫，韓國 Ching Young Choe 先生。杜女士現執教於瑞士蘇理支大學東方研究所。

「儒士與夷使」共十二章。在第一章「開放前夕的韓國」中作者指出，到大院君引退，高宗親政時為止，朝鮮在思想上固蔽於儒家思想；政治外交方面，以宗藩體制倚附於衰敗中的大清帝國，對日維持微不足道的交鄰關係；經濟上為農業自足，除為政治外交目的與中國及日本進行少量的貿易外，一切對外交換均視為有背國家利益而禁之。此即所謂「鎖國」。此種思想達到極致時，將世界一分為二，一方面是中國天朝，另一方面是野蠻的外夷，外夷則攘之而已。第二章為變的序曲，討論朝鮮高宗親政後日韓調整外交的失敗，雲揚艦事件、及森有禮到北京、天津探視中國與韓國關係等。第三章寫朝鮮在日本武力威脅下簽訂江華條約的過程及條約內容大要，名之為：突破傳統 (Break with the Past)。第四章曰外交的勝利，內容是韓日附約及商約的簽訂，日本測量韓國沿海，及開放仁川為商埠。第五章為貿易與通商口岸，研討了韓廷關於對外貿易的辯論，日本在釜山建租界、通商的進展

① 參見杜書 Preface Xiii 及 Bibliography。

情形，元山之開放，及一八七六至一八八三年韓日貿易大勢。以上四章全屬日韓關係，韓國對日本之開放，或日本近代勢力進入朝鮮。在中國重新考慮對韓政策影響下，韓國開始了自強計劃：設統理機務衙門，派遣工匠學生至天津學造武器，暗派官員考察日本的維新情形，編練新軍，並且與美國、英、德、法、俄簽訂條約。此為六、七兩章之內容。第八章曰來在中日間的韓國，即討論壬午事變及其後的發展，如濟物浦條約，中國駐兵朝鮮，中韓水陸通商章程之訂定，及日本不得已自朝鮮半島作戰術性的撤退。第九章檢視對外開放的韓國：閔氏家族當政時推行的該國第二階段的自強施政，外國顧問穆麟德的服務情形，韓與美、英、德之關係。第十章研探朝鮮沿海貿易，如海關之建立，仁川港及租界的發展，一八八三年後之釜山與元山，海運及電報，貿易與貿易商，韓國對外貿態度的改變，一八八三～一八八五間貿易的發展。第十一章稱為十年的結束，也就是由甲申事變之形成至中日天津條約的締結。第十二章為結論。

本書於一九七七年方出版，而且作者跑遍亞歐美三洲蒐羅史料，所以本書第一個特點是資料豐富。所附照片使我們對那些耳熟能詳的人物如金弘集、金玉均、黑田隆清、穆麟德等有了更清晰的印象。穆麟德的履歷及其在韓所扮演的角色，是本書首次清清楚楚的交代出來。依中國資料，國人關於朝鮮局勢的議論始於丁日昌，而作者從英國檔案中查知，丁日昌之言論乃在英駐華公使威妥瑪向總署進言之後。^②類似此種新的發現，本書中所在多有。

作者有許多獨特的看法。他說思想史是不能自外交政策分離的。^③雖然這句話也許該說成：外交政策與思想史是不能分離的，但作者的體會是不錯的，本書也的確作到了以思想文化觀察外交，尤其對初期接觸中思想文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般評論皆以為朝鮮的閉關（Seclusion）為消極行為。作者則謂朝鮮以朝貢事中國之大，透過對馬藩交日本之鄰的閉關乃抵制中日之策，對該國而言為積極的構思，為自給自足制的反應，有利於保持東亞的均勢，直到十九世紀，閉關乃朝鮮的傳統，因其適於朝鮮在東亞的特殊處境^④。由於有清一代中、韓、日三國間均有外交、貿易關係，我已不認為所謂中、日、韓為閉關或鎖國之邦為正確。那純粹是西洋人以西洋為中心的說法。儘管如此，我仍以為上述杜婷娜教授的看法是突出的。大家都知道朝鮮同意與日本調整外交乃日本一步步武力威脅而來，但在本書之前似乎無人

② 頁八六。

③ Preface, Xii.

④ 頁四～五。

指出，高宗鑑於中國與日本訂約，允日使駐京，德宗且接見日使，故已有應變之心。^⑤

本書有兩個重點，一在分析韓國對日、對西方之條約關係，商埠之開闢及國際貿易，一在探討外國思想及物資進入半島後所引起之反響；本書大致在尋求回答兩個大問題：韓國近代化何時開始，結果及其原因；日本在朝鮮半島帝國主義之方向及性質^⑥。關於第一個問題，作者既不以甲午更張為近代化之起點，也反對韓國若干學者所主十八世紀朝鮮已萌商業化之芽，故近代化應自此始的說法。她說作此說者乃基於不願將發動近代化的功勞歸於外人的心理，但歷史事實並非如他們所說。因為在一八七六之前，政府從未有支持經濟發展的政策，而外國貨物進入後，仍以舊的管道運銷，且十八世紀興起的商人在一八七六年後顯然無甚活動，這顯示他們缺少與外國商人進行貿易的基本條件——資本與商業知識^⑦。她指出韓國的近代化乃啓於一八七六年簽訂江華條約，乃激於東亞強權政治的鬭爭，而非因受西方侵略的刺激。^⑧作者以為朝鮮近代化之失敗，初由大院君保守勢力的牽制，繼因專政的閔妃系缺乏領導人材，而重要者為儒家思想重損益、正名，無啟發革新 (Innovation) 的成分，而韓國當時乃篤信儒教之國。此外中日衝突牽涉到朝鮮內政，也是原因之一^⑨。對儒家思想的評論雖顯有值得商榷之處，然各點不失為深刻的思考。作者將中日韓的對外開放及近代化比較而觀為另一特色。她說韓國對日本叩關的應付，如中國、日本應付西洋人一樣。三國面對外國挑戰的初期反應是：驚惶，拒絕威脅其傳統的外來影響。三國的開放是三段過程式：訂約，暴力反應，更多的條約。然而三者開放後的調整適應不同，決定了此後各自的命運。朝鮮初期的反應不比中國及明治以前的日本之反應為慢弱，然其後的調整型式類於清而異於日，其原因又既不盡同於清，也異於日。第一，韓國是封貢制度失效，夾在中日之間的犧牲者；第二，如同中國，以新儒學為國教，思想上無日本之多元化，故缺乏適應彈性；第三，中國幅員大，地方發生相當均衡力，日本中央人員也多本地方藩閥，惟朝鮮國小而高度中央集權，地方既無力量資源，也無參與設計決策之機會，每不知事情之究竟，故人民盲目反西化之日本。第四，在經濟上，日本以農業及小型工業為工業

⑤ 頁一四～一五。

⑥ Preface, Xii.

⑦ Preface, Xii, 頁二二四。

⑧ 頁二二〇。

⑨ 頁二二一。

成長打好基礎，朝鮮則停在農業階段，且毫無自強之勢。在日本，推動經濟發展之力在政府之外，而韓國則經濟政策控制於政府^⑩。此種看法儘管未必人人相同，然以中日韓三國均為儒教國，比較研究乃屬必需。

本書值得注意的缺點也不少。大概由於已經有些書和文章用「韓國的開放 (The Opening of Korea)」為名，杜教授乃以「儒士與夷使」名其書，另以「韓國的開放」副之。我為了寫此書評而詳細的將本書讀了兩遍，然至今仍不知「儒士與夷使」的具體含義。本書為通論性質，並非考證某一問題之專題研究論文，故不宜瑣碎。然而事實上有些地方就犯了此病，如頁一五三列出過多人名。本書乃一韓國史，然作者的立場似乎把握不定。江華條約是在日本人的威脅下訂的，作者一面說韓國被迫簽訂此約(頁四十九)，然而又說此為朝鮮君臣的勝利(頁四十八)。第四章的序文說，朝鮮人一步一步的屈服於日本；違背著自己的意志，一個新時代開始了。然而作者偏偏名此章為「外交的勝利 (Victory of Diplomacy)^⑪」這就轉變成以日本為本書之主體了。作者這種把握不定的立場與其對日本帝國主義在朝鮮半島的行徑方向之認識有關，與其對中國立場的看法也有關。作者對中韓封貢關係算是有些了解的，故曾指出中國在一八七一年中日條約中未清楚列出不可侵犯的區域界限——國界為失策^⑫。不過了解的還不够，而且由於作者是來自以民族獨立為傳統的歐洲瑞士，所以對中國在封貢關係體制下的措施總覺得不對，而予指斥。例如她以中韓水陸通商章程中規定中國駐朝鮮商務委員由北洋大臣任命，朝鮮駐天津委員由該國王任命，為「事實上將北洋大臣和朝鮮王置於平等地位」，意即不應如此，國王應與皇帝平等。這是因為她不知道依據大清會典該國王本與總督或省區將軍平等，故往來公文用咨會；因為她將朝鮮視為獨立之國之故。該章程第二條規定駐韓華官享有治外法權，但在華韓人之民刑訟案均由中國官以中國法律治之。第四條規定韓人可自內地買土貨，然須憑執照，並繳納釐金。此舉使韓國商人之地位猶不如其他外國商人。作者說「縱在不平等條約時期，此章程太不平等，以至引起在韓其他國家之挑戰，而中國朝貢外交之推行大半無效」^⑬。作者應知，韓人不理在韓華人訟事，華人以華法審韓人乃清初以來之舊規^⑭，而韓人雖須完釐稅，然其規定不似對其他

⑩ 頁二二五～二二七。

⑪ 頁五十一。

⑫ 頁七，五～六，二一三。

⑬ 頁一四二，一四四。

⑭ 司法關係見張存武著：「清韓封貢關係之制度性分析」，杜書Bibliography 中列有。

外人之固定不可更改，其後韓人奏訴紅參稅重，清廷即減而免之，此種衡情調整措施的確只存於中韓關係中。作者說韓日關係調整發生於日本征韓論沈寂之後，故在日韓十年交涉中，日本雖以戰爭恐嚇，但無從證明日本外交領導人心中懷有侵韓的強烈傾向；其時日本之急務不包括吞併朝鮮^⑯。當然歷史上那十年中日本確未發動侵韓戰爭，但事前的征韓論，甲午戰後的併吞行為，對韓交涉中的橫暴恐嚇行為，以及一八八四年一面據天津條約撤兵，一面知會韓人謂日本據以駐兵朝鮮的濟物浦條約第五條並未失效的奸滑，均足彰其惡。日本西化的成功贏得西方人士的讚賞，然而中韓人民從來不信任日本。清季中國實行其對韓宗主權引起各國人至今指責不已，然而中國的惟一過錯也許是使得日本佔領朝鮮遲了十餘年。

綜而言之，「儒士與夷使」一書有許多優點，也有不少值得批評之處。它解答了許多問題，也留下了許多問題等待解答。這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

^⑯ 頁二一九。